

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

——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罗楚亮

(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文章以我国住户调查数据为基础,经验性地讨论了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表明,绝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联,即便控制了相对收入效应,绝对收入的影响仍较显著。因此无论是相对意义还是绝对意义,收入仍然是提升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但是另一方面,主观幸福感与收入水平之间的相关程度并不高,主观幸福感决定中的非收入因素也值得进一步关注。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绝对收入;相对收入

中图分类号:F061.5;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9)11-0079-13

一、引言

我国改革开放极大地推动了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在增长优先的发展模式中,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与人们的福利改善过程是一致的,经济增长必将导致福利改善或幸福感的增强。经济学分析通常也暗含假定,经济增长是一个社会追求目标,社会成员都满足于更高的收入水平。但一些观察事实却与此并不一致。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收入水平可能有大幅度增长,但主观幸福感可能不会相应提高。通过对美国长期收入增长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Easterlin较早发现了这一现象。后来的一些研究又重申了这一事实(Easterlin,1995;Oswald,1997)。美国1991年人均实际收入是1946年的2.5倍,但主观幸福程度基本上保持不变(Easterlin,2001;Frey与Stutzer,2002)。日本1987年的人均实际GDP比1958年高5倍,但主观幸福感并没有增长。当然,在相同的经济体中,收入水平高的个人,主观幸福感也相对会高一些。

在对这种不一致性的解释中,一方面强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中存在收入以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如社会环境、文化传统、政治影响以及回答者的其他个人特征等;另一方面继续深入讨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联系形式,即对主观幸福感起作用的是绝对收入水平还是相对收入水平,在宏观时间序列数据中,经过汇总的收入水平不能体现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9-08-12

作者简介:罗楚亮(1976—),男,湖南邵东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McBride, 2001)。强调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决定性作用的代表人物主要是 Easterlin, 他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强调主观幸福感取决于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 至少相对收入比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 主观幸福感随着自身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正向变化, 但随着他人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反向变化 (Easterlin, 1995)。如果所有人的收入水平都提高, 那么尽管自身收入增长导致其主观幸福感的增强, 但这一正效应会被其他人的收入增长所抵消。通过对日本、美国及 9 个欧洲国家的主观幸福感与收入增长的动态关系的比较分析, Easterlin (1995) 总结认为, 经济中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并不必然导致经济中每个个体主观幸福感程度的相应提高。

在主观幸福感与相对收入关系的研究中, 一般假定存在某个参照组, 个人的主观幸福感评价与参照组的收入水平之间负相关。Ferrer-i-Carbinell (2005) 认为, 相对于其他客观变量来说, 收入在主观幸福感的决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相对收入越高, 则主观幸福感越强, 但这种效应在不同的收入组中是不一样的, 对于收入低于参照组的人群来说, 自身收入与参照组收入水平的差额使他们的主观幸福感程度产生了比较严重的负效应; 而对于收入高于参照组的人群来说, 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所产生的正效应则相对要低。Clark 与 Oswald (1996) 以收入函数预测值作为相对收入的测度, 发现自我评价的主观幸福感与绝对收入水平之间只有非常微弱的相关性, 但与相对收入指标则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 而且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要远远大于绝对收入。考虑主观幸福感的相对收入效应的另一种方式是研究收入变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强调当期收入与过去收入的纵向比较效应。Graham 与 Pettinato (2001) 检验了三个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当前经济状况与过去的比较、对未来经济状况改善的预期以及对所处社会中经济地位的自我评价, 结果表明这三个变量对主观幸福感都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如果主观幸福感取决于与他人的比较, 那么收入与财富绝对数量的影响将是有限的。Graham 与 Pettinato (2001) 发现, 绝对收入增加并不能提升整个社会的生活满足感, 但能提高底层人群的生活满足感; 他们在 2002 年的研究中还发现中间阶层对自己的相对地位具有更强的不满足感。不同收入阶层中, 相对收入效应也是有差异的。当收入水平比较低时, 绝对收入的增长能够导致主观幸福感的增强; 但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 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弱化, 而相对收入的影响则更为重要 (Ferrer-i-Carbinell, 2005)。但也有部分研究对相对收入与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提出了不同的经验证据。如 Ferrer-i-Carbinell (2005)、Frijters 等 (2004) 对德国主观幸福感与收入关系的研究发现: 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是重要的。他们根据面板数据估计了主观幸福感决定的固定效应模型, 发现 1991—2001 年, 原东德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中的 35%—40% 可以由实际收入的大规模增长所解释。

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曾慧超和袁岳(2005)的调查报告指出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曾引起各界的广泛讨论。邢占军(2005)报告了相关主观幸福感量表的测试结果,田国强和杨立岩(2006)从理论上讨论了收入与幸福的关系。Knight 和 Song(2004)经验性地讨论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决定因素,罗楚亮(2006)对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的解释因素进行了讨论。本文将在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 2002 年全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经验性地讨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特别是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在主观幸福感决定中的作用。

二、数据描述与主观幸福感的分布特征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对 2002 年全国城乡住户所做的抽样调查,这次调查是由中外研究人员共同设计、由国家统计局协

表 1 2002 年住户调查样本基本信息

指标	农村样本	城镇样本	流动人口样本
住户数	9 200	6 835	2 000
个人数	37 969	20 632	5 327
县/城市数	120	70	27
省份数	22	12	12

助实施的。调查对象涉及城乡常住人口以及从农村进入城镇的流动人口,各类人群样本数量及覆盖情况可见表 1。城乡常住人口的全部样本来自国家统计局常规住户调查的大样本框,相对于我国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多数研究,本次调查的样本规模和覆盖面都能保证本文所使用的样本具有更好的代表性。本次调查设计了一个问题:“总的来说,您现在幸福吗”,要求家庭户主或主要成员回答,备选项按照幸福感程度的差异性分为 5 个级别。回答情况可见表 2。

农村常住人口样本中,自我评价为“非常幸福”或“幸福”的分别占到总样本的 15.5%和 45.84%,如果把这两类人群视为“幸福”人群,则这一比例为 61.34%。选择“不幸福”与“非常不幸福”的回答者分别为总样本的 7.96%和 0.99%,这两类回答共计占总样本的 9%左右。城镇样本中,有 76 户家庭选择了“很难说”或未回答,占全部样本总量的 1.11%;多数回答者倾向于选择“幸福”或“一般”,前者占调查样本总量的 48%,后者占 31%;480 位回答者选择了“非常幸福”,占总样本的 7%;选择“非常幸福”与“幸福”的回答者共占全部样本的 55%;12%的回答者选择了“不幸福”或“非常不幸福”,分别占全部调查样本的 10%和 2%。由农村进入城镇的暂住人口样本中,“非常幸福”与“幸福”的比例分别为 6.3%和 37.15%,因此自我评价为幸福的人群比重为 43.45%,大多数的选择集中于“一般”,占全部样本的 44.85%;“不幸福”或“非常不幸福”的比例分别为 9.4%和 1.8%,两类合计为 11.3%。农村样本中自我评价的主观幸福感程度要高于城镇样本,自我评价为“幸福”或“非常幸福”的农村样本要比城镇样本高出 5 个百分点。而由农村进入城镇地区的暂住人口样本的主观幸福感的自我评价更低,“幸福”与“非常幸福”的样本比例比城镇样

本要低 12 个百分点,比农村样本要低 27 个百分点。

表 2 主观幸福感的分布特征

人口 主观感受	农村常住人口		城镇常住人口		农村进入城镇的暂住人口	
	N	%	N	%	N	%
非常幸福	1 426	15.5	480	7.02	126	6.3
幸福	4 217	45.84	3 307	48.38	743	37.15
一般	2 646	28.76	2 129	31.15	897	44.85
不幸福	732	7.96	692	10.12	188	9.4
非常不幸福	91	0.99	151	2.21	36	1.8
很难说或缺失值	88	0.96	76	1.11	10	0.5
合计	9 200	100	6 835	100	2 000	100

表 3 不幸福的原因分布

住户 原因分类	农村住户		城镇住户		暂住人口	
	N	%	N	%	N	%
收入太低	523	63.63	444	53.24	153	68.92
将来生活不安定	41	4.99	92	11.03	26	11.71
身体不好	103	12.53	51	6.12	7	3.15
家庭矛盾	42	5.11	23	2.76	9	4.05
个人问题	41	4.99	19	2.28	5	2.25
下岗失业			146	17.51		
经常受到歧视					4	1.8
其他问题	72	8.76	59	7.07	18	8.11
合计	822	100	834	100	222	100

表 3 给出了自认为不幸福的原因分布。“收入太低”成为不幸福的最主要原因,可能是绝对意义上的,也可能是相对意义上的。城镇居民中,导致不幸福的第二重要原因则表现为“失业下岗”;而“将来生活不安定”在城镇住户和城镇暂住人口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从居民对主观幸福感的自我评价来看,收入水平是影响各人群主观幸福感的最主要因素。

三、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描述性关系

1. 绝对收入水平。图 1 和表 4 分别从不同角度描述了主观幸福感与收入水平(家庭人均总收入)的关联性。图 1 给出了我国城乡及流动人口不同样本在不同收入组的主观幸福感分布特征,横轴是将收入进行 20 等份分组,纵轴则为每个收入组的平均主观幸福感程度;表 4 则给出了不同主观幸福感状态下的收入水平。从图 1 中不难发现,对于农村、城镇以及流动人口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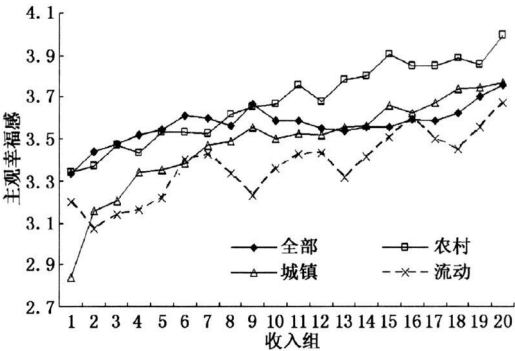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收入组的主观幸福感

个样本人群而言,收入水平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正相关性。就总体趋势来说,高收入组比低收入组具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但这一特征在将这三类样本合并所形成的全部样本中有所例外。在全部样本人口的 9 到 15 组人群中,主观幸福感不仅没有表现出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上升的趋势,反而略有下降倾向。

表 4 中,对于每一个特定的人群,主观幸福感程度越高者所对应的收入水平也相对较高,这种正向关系在各等级之间都存在。如农村和流动人口样本中,“非常幸福”者的平均家庭人均收入比“很不幸福”者要高出一倍。但表 4 也有几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一是不同人群组之间,尽管具有相同的主观幸福感程度,但收入水平可能有很大差异。如农村样本中,“非常幸福”人群的家庭人均收入为 3 297 元,但城镇样本中“非常幸福”人群的平均家庭收入则为 9 568 元,大致相当于前者的 3 倍。这一因素甚至造成了在各类样本合并组成的全部样本中,“非常幸福”人群的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甚至低于“幸福”人群。事实上,“非常幸福”的农村样本人群的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仍低于城镇样本中的“很不幸福”人群。二是在城镇样本和流动人口中,“非常幸福”人群的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差异要小于其他各主观幸福感程度之间。这可能表明,流动人口中“非常幸福”人群与城镇居民具有更好的社会融合,或许可以推论认为,流动人口的收入增长促成了其与当地城镇居民的融合。三是主观幸福感程度与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非常低(当然这些相关系数都是统计显著的),且全部样本的相关系数低于各分类样本。

表 4 不同主观幸福感程度下的收入水平

回答/样本	农村	城镇	流动	全部
非常幸福	3297.44 [2952.52]	9568.47 [5886.40]	9096.12 [12373.69]	5138.22 [5626.08]
幸福	2932.45 [2326.42]	9285.06 [6002.07]	7001.43 [5399.85]	5841.96 [5383.53]
一般	2423.00 [1888.82]	7907.60 [4958.39]	6283.63 [5503.76]	5095.74 [4713.26]
不幸福	2105.96 [1960.91]	6138.68 [4133.32]	5208.78 [3833.74]	4197.88 [3807.93]
很不幸福	1616.37 [1357.64]	5424.74 [3665.80]	4492.24 [2982.61]	4055.79 [3465.79]
收入和主观幸福感的 R ²	0.1602	0.1955	0.1377	0.0739

注:[]内数值为标准差;表 4 给出的收入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在 0.001 的水平下显著。

2. 欲望:主观贫困线。主观贫困线的询问方式为:“根据您家的实际情况,您认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每月/年需要多少钱”,^①我们以这一变量来度量欲望高低,即如果家庭的主观贫困线越高,则认为其欲望也越强;反之则越弱。

Lee Rainwater(1994)的研究表明维持最低生活所需要的收入与目前实际收入的弹性为 1。^②如果这一参数成立,并且欲望强度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向与实际收入相反,则收入增长的意义将可能完全被欲望强度的上升所

抵消。图 2 描述主观贫困线与实际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如果以方程 $\ln spl = \alpha + \beta \ln hinc$ (其中 spl 、 $hinc$ 分别表示主观贫困线和家庭实际收入水平) 的估计系数 β 来表示维持最低生活所需要的收入水平对实际收入水平的弹性, 则不难发现, 相关的系数估计值都要远远小于 1。城镇及流动人口的主观贫困线对家庭实际收入的弹性要远远高于农村居民, 这意味着即便欲望与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具有完全不同的影响方向, 但由于收入水平的上升对欲望增强的影响并不是一对一的, 收入水平上升所带动的欲望上升幅度要小于收入增长的幅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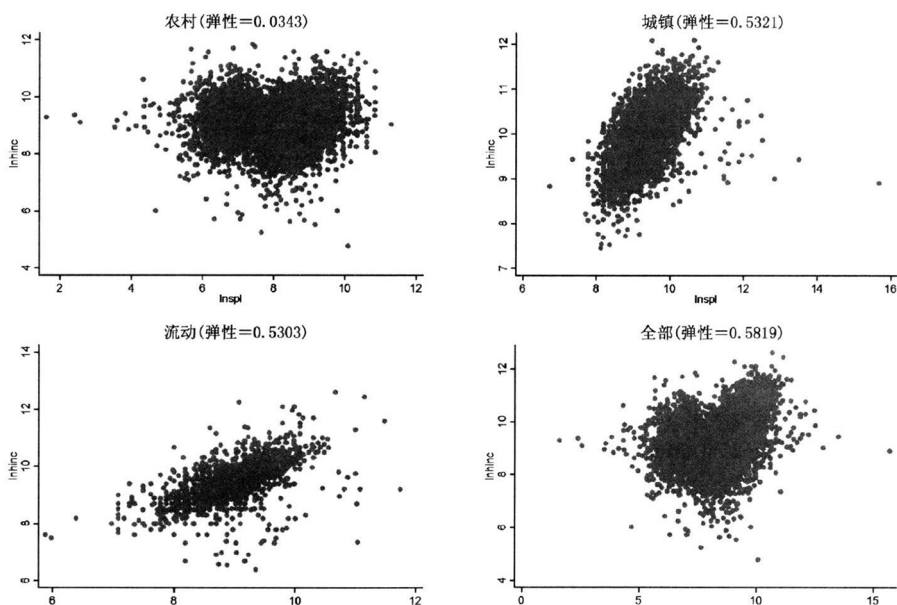


图 2 主观贫困线与实际收入水平的散点关系图(对数形式)

表 5 给出的是全部样本中不控制其他因素时, 主观幸福感同收入和主观贫困线之间的相关性。从中不难发现, 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系数为正, 但主观贫困线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系数为负。如果定义家庭实际收入与主观贫困线之间的差额为欲望的实现程度, 则欲望的实现程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如果实际收入水平相对于主观贫困线越高, 主观幸福感程度也将越高。尽管这种正相关性在数值上非常之低, 但比起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来说, 已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这在对数形式的度量结果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3. 相对收入效应。这里以所处环境的平均收入作为相对收入的参照, 因此这种相对收入表示的是横向比较的意义。参照组的收入水平越高, 将负向地影响个人的主观幸福感程度。人群参照组以地理概念为主, 考虑的是不同

省份以及不同县内平均收入水平对个人主观幸福感程度的影响。由于不同人群之间可能存在着社会意义上的分割性,因此对参照组的平均收入水平同时考虑了两种类型:一是在给定范围内的所有人群具有相同的参照组,即城乡以及流动人口都具有相同的参照对象;二是考虑到不同人群的参照组可能存在差异。

表 5 收入、主观贫困线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全部样本)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	
	5 级测度	0—1 测度		5 级测度	0—1 测度
hinc	0.0976	0.1022	ln hinc	0.1081	0.1099
spl	-0.0137	-0.0146	ln spl	-0.0993	-0.0833
hinc-spl	0.0996	0.1044	ln hinc-ln spl	0.1904	0.1750

如果以 $\bar{y}_g$ 表示人群组 g 的平均收入,则相对收入可定义为实际收入与人群组平均收入的对数差,也即 $\ln y_i - \ln \bar{y}_g$ 。这里分别以调查时所在省份和县(或区)为基础来界定参照组。鉴于城乡居民之间以及城镇常住人口与暂住人口之间可能存在的分割性,我们也考虑了户口特征和居住地区相结合的人群组划分方式。图 3 给出了选择不同参照组所得到的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模拟,^③使用的是全部样本。该模拟试图检验,由于整个样本人群中存在一定的分割性,因此绝对收入水平或许并不是主观幸福感程度的合适因素。参照组的适当选择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剔除绝对收入水平在不同人群组之间的量纲差异。图 3 分别给出了以省份和县级单位为基础以及是否考虑三类人群户口差异性的相对收入水平度量指标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参照组选择以县为基础,并且对城镇、农村与流动人口分别计算相对收入水平,也就是以县为基础并按照人群特征分别确定参照人群所定义的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表现出的一致性的单调递增关系,即相对收入水平越高,则主观幸福感程度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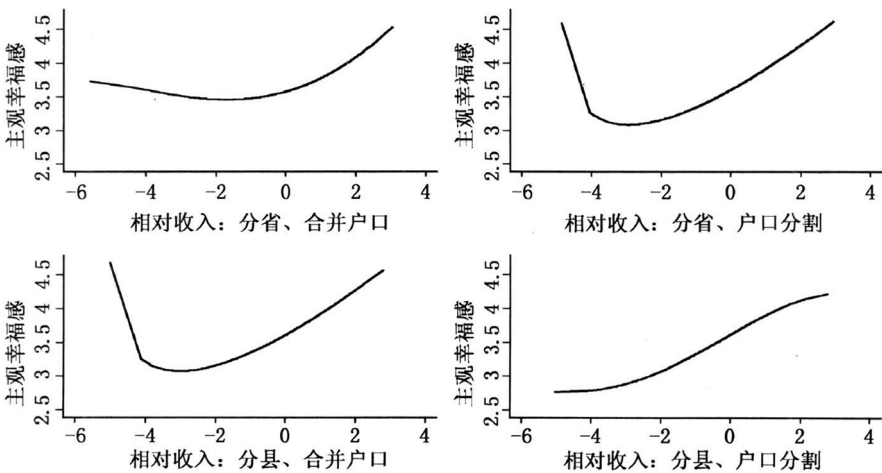


图 3 主观幸福感与相对收入的关系

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高于农村居民,但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程度低于农村居民,假设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具有不同的参照人群,如果在计算相对收入时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合并计算,则城镇居民的相对收入水平仍将高于农村居民,但主观幸福感程度却较低,因此就会出现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反向变动。如果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相对收入水平分别计算,则农村居民中主观幸福感程度较高者对应的相对收入水平也会较高,而城镇居民中也如此。在此情形下,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更有可能表现出正相关性。

4. 收入状况相对变化与主观幸福感。相对收入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当前绝对收入相对于过去的变化。对收入相对变化的度量是通过对被调查者对目前生活状况与 5 年前^①的比较来构造。这里只考虑了改善与恶化两种情形。表 6 表明,生活状况相对改善会导致主观幸福感程度上升,并且生活状况相对变化所导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在农村居民中最为明显。城镇居民中,生活状态改善者与恶化者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幅度最小。可能的原因在于,即便城镇居民中生活状况改善者,仍对其生活状态改善的预期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

在生活状态改善的人群中,农村人群 71.63% 的人对主观幸福感的自我评价是幸福;而城镇人群这一比例为 64.72%,两者相差将近 7 个百分点。在生活状况恶化的人群中,城镇样本对主观幸福感的自我评价仍未幸福的为 40%,而农村样本为 36.3%,城镇样本高于农村样本。不过,城镇居民中,生活状况恶化者的比重则要远远高于农村居民。从 5 级测度的主观幸福感看,农村居民中生活状况改善样本的主观幸福感程度最高,达 3.8788,非常接近于“比较幸福”;生活状况恶化样本的主观幸福感程度则只有 3.086,非常接近于“一般,不好也不坏”的评价水平。两者之间的差距基本上相当于主观幸福感程度的一个等级标准。应当注意的是,在流动人口样本中,生活状况恶化者的主观幸福感程度低于 3,也就是在“一般,不好也不坏”以下。

表 6 收入状况相对变化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样本	农村	城镇	流动	全部
0—1 测度				
改善	0. 7163 [0. 4508] (5612)	0. 6472 [0. 4780] (1508)	0. 5674 [0. 4956] (1112)	0. 6836 [0. 4651] (8283)
恶化	0. 3630 [0. 4814] (449)	0. 4003 [0. 4901] (1429)	0. 2540 [0. 4388] (63)	0. 3869 [0. 4872] (1941)
5 级测度				
改善	3. 8788 [0. 7881] (5571)	3. 6742 [0. 7593] (1498)	3. 5690 [0. 7552] (1109)	3. 7993 [0. 7876] (8178)
恶化	3. 0860 [1. 0634] (442)	3. 1512 [0. 9627] (1409)	2. 8254 [0. 9425] (63)	3. 1254 [0. 9876] (1914)

注:[] 内为标准差; () 内为样本数。

四、主观幸福感决定的绝对收入效应与相对收入效应

表 7 和表 8 给出的是各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其中表 7 给出的是 Probit 模型的边际效应,表 8 给出的是排序 Probit 模型的估计系数。在这两个估计结果中,我们都以三种形式来度量相对收入:家庭收入与主观贫困线的对数差,家庭人均收入与县级分类样本(城镇、农村以及流动人口样本)平均收

入的对数差,以及在最近若干年生活状况的相对变化(改善与恶化)。

表 7 各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边际效应(probit)

	1	2	3	4	5
ln incp(绝对收入)	0.078***	0.035***	0.01***	0.082***	0.025***
ln hinc-ln spl(相对收入 I)		0.079***			0.061***
ln incp-ln $\bar{y}_{count,type}$ (相对收入II)			0.132***		0.046***
改善				0.198***	0.182***
恶化				-0.11***	-0.095***
男性	-0.02**	-0.033***	-0.038***	-0.038**	-0.052***
年龄	-0.008***	-0.005*	-0.005*	-0.002	0.001
年龄平方/100	0.013***	0.01***	0.01***	0.008**	0.005
身体健康	0.152***	0.141***	0.143***	0.133***	0.124***
中等受教育程度	0.016*	0.035***	0.033***	0.042***	0.061***
高等受教育程度	0.03*	0.068***	0.052***	0.076***	0.107***
未婚	-0.083***	-0.066**	-0.065**	-0.053**	-0.037
离异	-0.163***	-0.17***	-0.173***	-0.16***	-0.169***
婚姻状况缺失	0.041	0.032	0.03	0.077	0.065
0—10 岁儿童比例	-0.249***	-0.17***	-0.11***	-0.184***	-0.081**
65 岁以上老人比例	0.013	0.051	0.053	0.07**	0.108***
身体欠佳成员比例	-0.275***	-0.251***	-0.251***	-0.237***	-0.215***
家庭人口总数	0.024***	0.013***	0.017***	0.018***	0.006*
样本数	17 952	17 948	17 952	17 952	17 948
LR Chi2	857.30	1 182.14	1 045.62	1 722.08	1 954.50
观测概率	0.5716	0.5716	0.5716	0.5716	0.5716
预测概率	0.5738	0.5752	0.5744	0.5764	0.5778

注:z 统计量未列出;*、**、***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表 8 同)。

表 7 和表 8 都给出了只有绝对收入以及不同形式控制的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形式。表 7 的第 1 列只考虑了绝对收入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尽管农村居民收入较低而主观幸福感程度高于城镇居民,但绝对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总体上仍显著为正。没有控制相对收入时,家庭人均收入在平均水平的基础上每增长 1%将导致幸福的概率上升 7.8%。第 2、3、4 列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控制相对收入。如果主观幸福感决定中不存在相对收入效应,则不仅有关相对收入度量的指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同时绝对收入变量的估计系数也不会有显著性的变化。第 2 列的相对收入度量强调的是实际收入水平与欲望(主观贫困线)的比较,即相对收入 I。从估计结果看,当控制了相对收入后,家庭人均收入对数的边际效应下降了 50%以上,而相对收入 I 的边际效应则与第 1 列的绝对收入基本相当。第 3 列控制了相对收入 II,绝对收入的边际效应变得不显著,相对收入 II 的边际效应估计值达到 0.183,若家庭人均收入相对于平均收入的对数值上升 1%,则幸福的概率就会上升 18 个百分点。从边际效应的估计值看,这两种形式测度的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要高于绝对收入。第 4 列对相对收入的度量强调的是纵向比较意义,参照对象是本人的历史状态。生活状态改善将导致主观幸福感的增强,幸福概率将上升 19.8 个百分点;而生活状态恶化将导致主观幸福感的下降,幸福概率将下降 11 个百分点。当同时控制这三种意义上的相对收入效应时(第 5 列),家庭人均收入对数边际效应的估计值将从 0.078 下降到 0.

025,即家庭人均收入对数在其平均水平的基础上每增长 1 个百分点,幸福的概率将增长 2.5 个百分点,而这一幅度不到未控制任何相对收入效应时的 1/3。对相对收入的控制导致了主观幸福感决定中的绝对收入效应的下降,此外,各相对收入度量指标的边际效应也都具有统计显著性,相对收入 I 和相对收入 II 的边际效应的估计值也在较大程度上要高于绝对收入。

表 8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ordered probit)

估计方程	1	2	3	4	5
ln incp(绝对收入)	0.172***	—0.011	0.074***	0.183***	0.037***
ln hinc-ln spl(相对收入 I)	0.354***			0.142***	
ln incp-ln $\bar{y}_{count,type}$ (相对收入II)			0.183***		0.133***
改善				0.493***	0.45***
恶化				—0.345***	—0.307***
男性	—0.028	—0.076***	—0.057***	—0.072***	—0.109***
年龄	—0.03***	—0.022***	—0.024***	—0.015**	—0.009
年龄平方/100	0.04***	0.033***	0.034***	0.026***	0.02***
身体健康	0.359***	0.334***	0.334***	0.31***	0.287***
中等受教育程度	0.017	0.063**	0.06***	0.081***	0.126***
高等受教育程度	0.018	0.078**	0.109***	0.135***	0.215***
未婚	—0.228***	—0.182***	—0.188***	—0.154***	—0.114**
离异	—0.454***	—0.481***	—0.468***	—0.447***	—0.469***
婚姻状况缺失	—0.039	—0.079	—0.081	0.024	—0.027
0—10 岁儿童比例	—0.67***	—0.299***	—0.491***	—0.516***	—0.251***
65 岁以上老人比例	—0.054	0.051	0.038	0.091	0.187**
身体欠佳成员比例	—0.823***	—0.759***	—0.774***	—0.73***	—0.678***
家庭人口总数	0.061***	0.042***	0.034***	0.044***	0.018**
样本数	17 789	17 785	17 789	17 789	17 785
LR Chi2	1 072.14	1 456.29	1 365.60	2 293.26	2 575.39

表 8 估计结果所显示的主观幸福感决定中的收入效应变化特征与表 7 基本类似,但表 8 所给出的是根据排序 Probit 模型所得到的系数估计值,而不是边际效应估计值。在没有对相对收入控制的情形下(表 8 第 1 列),绝对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对数值的估计系数为 0.172,当控制相对收入 I 时(表 8 第 2 列),绝对收入的系数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控制相对收入 II 时(表 8 第 3 列),绝对收入的估计系数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至 0.074。如果同时控制住这三种意义上的相对收入效应时(表 8 第 5 列),绝对收入的估计系数下降至 0.037。各收入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相对收入在主观幸福感决定中具有显著的影响。与此同时,即便控制了相对收入,绝对收入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仍将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一结果表明,即便是在横截面数据中,主观幸福感决定中的绝对收入效应仍然显著。

表 9 考虑了不同人群主观幸福感决定中收入效应的差异性。这里的省略人群为城镇居民,如果不控制相对收入效应,则不难发现农村样本中,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边际效应高于城镇居民,但流动样本则低于城镇居民。在农村居民内部,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要更为强烈。当控制相对收入效应后,绝对收入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的差异性大幅度缩小。相对收入 I 在城镇以及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决定中不具有统计显

著性,但在农村居民中,这种欲望相对满足意义上的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效应则为显著,并且也显著高于城镇居民。在城镇居民中,相对收入Ⅱ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在农村与流动人群中,这种效应要显著低于城镇居民,并且在农村人群中,这一效应甚至为负。^⑤从根据生活状况变化所度量的主观幸福感看,农村人群与流动人群中,生活状态改善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要远远高于城镇居民;而生活状态恶化对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所造成的损害则比农村居民与流动人群要严重得多。其他控制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都在情理之中。男性回答者的主观幸福感要显著低于女性;主观幸福感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出 U 型关系,即先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一定年龄后随着年龄的继续增长而上升。身体健康者对主观幸福感的评价也显著为正。就全部样本而言,受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也具有显著效应,受教育程度越高者,对主观幸福感的评价也相对较高。婚姻状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表明,未婚与离异者的主观幸福感评价要显著低于有配偶者。家庭人口结构特征对主观幸福感也具有显著影响。健康状况较差的家庭的主观幸福感相对较低,家庭人口规模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效应,这可能与我们的样本构成有关,由于没有对城乡样本做进一步区分,而农村人群具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更大的家庭人口规模,因此这一变量在较大程度上是由农村人群中具有更高的主观

表 9 主观幸福感的收入效应

估计方程	Probit 模型的边际效应		排序 Probit 模型的估计系数	
	1	2	3	4
ln incp	0.122***	0.092***	0.288***	0.248***
ln hinc-ln spl		-0.002		-0.015
ln incp-ln $\bar{y}_{count,type}$		0.105***		0.244***
改善		0.049***		0.119***
恶化		-0.127***		-0.336***
交叉项				
农村样本×				
ln incp	0.026***	-0.007**	0.076***	0
ln hinc-ln spl		0.058***		0.122***
ln incp-ln $\bar{y}_{count,type}$	-0.166***		-0.415***	
改善		0.188***		0.493***
恶化		0.036		0.017
流动样本×				
ln incp	-0.011***	-0.038***	-0.011***	-0.058***
ln hinc-ln spl		0.044		0.029
ln incp-ln $\bar{y}_{count,type}$		-0.07***		-0.199***
改善		0.232***		0.417***
恶化		0.098		-0.066
样本数	17 952	17 948	17 789	17 785
LR Chi2	1 456.29	1 365.60	2 293.26	2 575.39

注:表 7、表 8 中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口结构等变量也包括在本表的估计结果中。z 统计量未列出;*、**、***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

幸福感所造成。65 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通常并不显著,或具有正效应(表 7 和表 8 的第 5 列)。0—10 岁儿童的比例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这与通常的设想有较大差异,但儿童数量增长同时意味着相应支出的增长。

五、主要结论

尽管收入并不是决定主观幸福感的唯一因素,但是在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无疑具有显著的正向关联,也就是说,收入仍是提升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高收入者的主观幸福感程度相对较高;但另一方面,主观幸福感与收入之间的相关程度并不高。这也与大多数的既有研究结论相同。本文进一步从三个角度定义了相关参照对象:主观贫困线、给定人群的平均收入水平以及前期的生活状况,这也给出了不同意义下的相对收入水平。描述性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的结果都表明,相对收入水平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具有重要影响。尽管如此,主观幸福感决定中的绝对收入效应仍然较为显著。可见,收入增长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主观幸福感与收入水平之间的相关程度并不高,主观幸福感决定中的非收入因素也值得进一步关注。

注释:

- ①城镇和流动人口样本中以月为计算单位(已调整至年),农村样本中以年为计算单位。
- ②但在早期的研究中,Kilpatrick 在 1973 年利用了 14 年的跨期数据发现维持生活所需收入对收入的弹性为 0.6。这些结论均转引自 Easterlin,《构建一个更好的“满意度”理论》,载布鲁尼和波尔塔主编《经济学与幸福》,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 ③纵轴为 5 级测度的主观幸福感,横轴为相对收入,模拟方程为比例多项式。
- ④对于这三类样本人群,这一变量的构造方式都略有差别。在城镇样本中,改善与恶化的识别是通过当前生活状况在本市的相对位置与 1995 年时该住户生活状况在本市的相对位置的比较来实现的;在农村样本中,询问的方式为“与五年前相比,您现在的生活如何”;对于流动人口样本,比较的对象是当前状况与外出打工前的状况。
- ⑤相对收入 II 在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决定中的边际效应或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并且其绝对值要明显高于城镇居民,因此这就意味着农村居民中,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形下(特别是绝对收入效应),相对收入 II 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负。

参考文献:

- [1]路易吉诺·布鲁尼和皮尔·路易吉·波尔塔. 经济学与幸福(傅红春、文燕平等译)[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2]罗楚亮. 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J]. 经济学季刊,2006,(3):817—840.
- [3]田国强,杨立岩. 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J]. 经济研究,2006,(11):4—15.
- [4]邢占军. 测量幸福——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5]曾慧超,袁岳. 2004 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A]. 汝信等. 2005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

析与预测[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6]Alesina A, Di Tella R, MacCulloch R.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Ar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different?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 88 (9—10): 2009—2042.
- [7]Blanchflower, Oswald. 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R]. NBER working paper No. 7487, 2000.
- [8]Easterlin R A. Income and happiness: Towards a unified theory[J]. Economic Journal, 2001, 111 (473): 465—484.
- [9]Ferrer-i-Cardinell. Income and well-be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mparison income effect[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 89, 997—1019.
- [10]Frijters P, Shields M, Haisken-DeNew J. Money does matter! Evidence from increasing real incomes in East Germany following reunific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 (3): 730—741.
- [11]Frey and Stutzer. Happiness,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J]. Economic Journal, 2004, 110(10): 918—938.
- [12]Frey and Stutzer. What can economist learn from happiness research?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2, XL (6), 402—435.
- [13]Graham and Pettinato. Happiness, markets, and democracy: Latin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1, (2): 237—268.

Absolute Income, Relative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the Sample Data of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s in China

LUO Chu-l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household survey, the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relation between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absolute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ven if the effect of relative income is eliminated. Therefore, the incom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mprov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Bu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ncome level is not strong, so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ome non-income factors.

Key words: subjective well-being; absolute income; relative income

(责任编辑 许 柏)